

清末新小说中的“新中国”想象

郭继宁, 郑丽丽

(唐山师范学院 中文系, 河北 唐山 063000)

摘要:从具有互文关系而政治倾向迥异的四篇清末新小说可以见出,其时知识精英对中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共同信念,从中可以复现当时知识精英对未来中国的道路设计、实现途径及远景规划的全景。清末新小说对于“新中国”的想象,具有政治启蒙目的,以实现“小说”救国的宗旨。但这些小说文本仅仅停留于“民族国家”想象,尚未完成国家理论的建构。

关键词:清末新小说;“新中国”;想象;民族国家;互文性;现代性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09)04-0150-04

辛亥革命前10年政治思想的萌动,都直接或间接地在小说中得以表述,而这正是清末新小说(本文将“清末小说”的时间跨度限定在1902-1911年之间)的重要特征。所谓“新小说”,大多是对这样一种小说观的实践,已然成为文体升华事实的“新小说”,全方位地负载了救世济民的历史使命,也担当着知识普及与理念启蒙的原创性责任。马睿指出,这种小说观,正是被“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近代维新启蒙运动,在文学和语言日趋通俗化、平民化发展规律的推动下,凭借着外来文化的翻译交流,凭借着报刊恰逢其时的兴起,凭借着社会教育制度的改革这种种东风”而“推向了历史的聚焦点”^[1]。杨联芬认为“初衷并非小说或文学自身的发展,而是与立学会、搞演说一样的社会改革与公民启蒙教育”^[2]。

世纪初知识精英^①竞相把有关民族国家的重构倾注入“新中国”的想象上。各类知识人在小说中展现其理想,既是对时人爱国激情的激励,以达到“开民智、兴民权、新民德”的政治启蒙目的,又是指明走向未来的道路,以达“小说”救国的宗旨。本文拟以《新中国未来记》、《新年梦》、《狮子吼》、《新中国》为中心,对此一现象进行解析。

如若沿用内容、形式二分法,从内容上看,《新中国未来记》、《新年梦》、《狮子吼》、《新中国》分别代表不同政治倾向——改良-立宪派、无政府主义、革命-排满派、开明的保守派^[3]。除《新中国》所展现的是40年以后,其余3篇都是60年以后的新中国^②。从形式上看,《新中国未来记》、《狮子吼》均是未完成品,而《新年梦》、《新中国》则结构完整,且都通过梦幻形式来展现;《新中国未来记》、《新年梦》、《新中国》还都选择了正月初一作为未来时间点。新中国之“新”,首先从纪年这一时间质素的引入得以确立。

“专欲发表区区政见”^[4]的《新中国未来记》(1902),可以说是自发表以来被关注最多的政治小说。在此要强调的是,远在小说正式刊布之前,梁启超就已明确指出“新小说”“专在借小说家言,以发起国民政治思想,激励其爱国精神”^[5]。小说选择60年以后的正月初一为叙述起点,以孔觉民回溯《中国近六十年史》而拉开帷幕。借孔之演讲,指出“前六十年所创的‘立宪期同盟党’算是一桩最重大的了”。这一宪政党通过扩张党势、教育国民、振兴工商、调查国情、练习政务、养成义勇、调查外政、

^① 西方学者称之为“Elite”,梁启超曾以不同名称指涉,如贤人、人才、英雄、豪杰、君子、一二人、士大夫、士君子、秀异者、优秀分子等等,其意义大体相同,指一国之中少数具有影响力的人物。笔者据此统称为知识精英。

^② 《新中国未来记》、《新年梦》都明确指明在60年后,《狮子吼》为“光复五十年纪念会”,从“戏中戏”小生唱词“十年茹苦,造就新帮”与陈天华《绝命书》中“十年之后,经理有人,主权还复,吸收外国资本,以开发中国文明”推算,应该也是60年之后。

收稿日期:2008-10-13

作者简介:郭继宁(1963-),男,青海西宁人,唐山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主要研究文学理论。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现代中国乌托邦小说研究”(07BZW052),项目负责人:耿传明。

编纂法典等方式，“把广东自治的宪法得到手了。随后各省纷纷继起，到底做成今日的局面”^{[4]15}。两位主人公黄克强、李去病表征着梁启超的思想是显见的：温和的改良与激进的革命之纠结。两者的论辩逻辑，正是梁启超发表在《清议报》与《新民丛报》文章——诸如《过渡时代论》、《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新民说》、《论民族竞争之大势》、《国家思想变迁异同》、《民约论巨子卢梭之学说》、《敬告当道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论专制政体有百害于君主而无一利》、《释革》、《敬告我国民》等——的翻版。

在小说的第三回，黄克强与李去病就政府与国人的责任能力、暴力革命、民族主义、专制政体、破坏与建设、地方自治、外国会不会干涉以及国民教育等诸多重大问题，展开了长达43个回合的激烈论争。正如孔觉民所言：“这场驳论，一直重叠到四十几回，句句都是洞切当日的时势，原本最确的学理，旗鼓相当，没有一字是强词夺理的。”^{[4]37}从论辩的气势与前后文的呼应来看，这场争论实则以李默认黄的政见结束，于是才有了维新后的三大政党^①合为宪政党，实现君主立宪、外国来贺的局面。小说虽仅完成了5回，主旨则已在孔觉民的演讲和黄李激烈的争论中表达，毕竟“余欲著此书，五年于兹矣”。要言之，梁启超首先考虑的是作为社会效果的思想启蒙，而不再是传统文人所关注的辞章文体一类：“似说部非说部，似樵史非樵史，似论著非论著。”^{[4]5}

至于小说未完成的主要原因，缘自于梁启超思想转变后，放弃了革命论，无法延展李去病的性格逻辑。梁启超美洲之行，是搁笔的直接原因，最关键的是此行改变了梁启超的政治倾向。除了其师的“婉劝”与“不嫌于当时革命家之所为”外，更重要的乃是美国之行让他预见了中国以激进革命争取民权可能产生的灾难性后果，且发现即使生活在美国的华人，仍保持着传统中国人的思维方式^[6]。梁启超一方面深知破坏之后建设不易，另一方面对中国民智未开的事实颇为忧虑——列强环伺，一旦中国自乱于先，即有可乘之机，中国亟需的是变法图强、开通民智。

坚执激进立场的革命派也同样运用小说演绎

其理想，《狮子吼》^②（1905）就是其中典型的一例。虽然在政治立场上存在差异，《狮子吼》与《新中国未来记》却有着很多的相似之处。

首先，在“新中国”远景想象时间点的选择上，一是在“中国全国人民举行维新五十年大庆典之日”，一是举行“光复五十年纪念会”；其次，在制度路径的设计上，都寄希望于爱国志士与留学生，通过地方自治如《新中国未来记》中的广州自治、《狮子吼》中的民权村等，进而推进至全国；再次，托言小说演绎历史，将对未来现实的设想与现实中发生的主要政治事件融入到小说中；最后，两部小说都未完成，均约5万字的篇幅，而搁笔的直接原因，前者因梁启超赴美，后者因陈天华蹈海。这些惊人的相似，说明作为政治小说，作者们心向往之的是与现实相对立或超越现实的理想国家，强化“新中国”的必然，并将这种文学想象的“必然”托举为创设“新中国”的信念。

事实上，在当时事关“新中国”想象的小说中都可以找到大量相似之处，只不过叙述的重心不同而已，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本文涉及的四篇小说就有了互文关系，从中可以复现当时知识精英对未来中国的道路设计、实现途径及远景规划的全景，也就是说，西方民族国家观念传入中国后，建立一个新型的现代民族国家，成为知识精英的共同愿望。

《狮子吼》构拟出了一个作为“世外的桃源，文明的雏本”的“民权村”：“有议事厅，有医院，有警察局，有邮政局。公园，图书馆，体育会，无不俱备。蒙养学堂，中学堂，女学堂，工艺学堂，共十余所。此外有两三个工厂，一个轮船公司。”^{[7]37}这正是“地方自治”的形象化表述。“民权村”中的“豪杰”，“后日竟把中国光复转来，变为第一等强国”^{[7]36}。

陈天华生前所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在《狮子吼》中悉数出现：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事件、庚子之变、日俄战争、拒俄运动、苏报案、沈荇案等。小说因陈天华1905年12月8日于日本大森海湾蹈海自杀戛然而止。陈天华蹈海的初衷，在《绝命书》里赫然在目：“我不自亡，人孰能亡我者。惟留学生放纵卑劣，则中国真亡矣。……欲我同胞时时勿忘此语力除此四字，而做此四字之反面坚忍奉公力学爱国。恐同胞之不见听，而或忘之，故以身投

① “再说维新以后，国中三大政党，所谓‘国权党’，所谓‘爱国自治党’，所谓‘自由党’，常握一国政治上之权力，以迄今日。这三个党名，谅来听众诸君闻之已熟。虽一个主张中央政府的势力，一个主张地方自治的权利，一个主张民间个人的幸福，其宗旨各有不同，常常互相对立，激烈辩论。”见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6年，13页。

② 共8回，连载于《民报》1905年第二、三、四、五至七、八、九号。

东海,为诸君之纪念。”陈天华所希望看到的乃是“救国之实”——建立富强、民主、文明的民族国家,不再被称作“放纵卑劣”,至于实现途径,“鄙人以救国为前提,苟可以达救国之目的者,其行事不必与鄙人合也”^[8],与《绝命书》的青春激情相一致,《狮子吼》流贯着清末志士那种独有的奋不顾身的“烈士情怀”。

要言之,陈天华所主张的乃是“文明排外”——“‘自由’二字,是有界限的,没有界限,即是罪恶。……法律也不服从,社会上必定受他的扰害,又怎能救国呢? 依愚的意见,总要共立一个自治会,公拟一个自治章程,大家遵守自己所立的法律,他日方能担当国家的大事。”^{[7]50} 这与宪政主义的主张已相当接近了。

《狮子吼》里倡言学生注重“精神上的学问”——“不过是‘国民教育’四字。换言之,即是民族主义。不论是做君的,做官的,做百姓的,都要时时刻刻以替民族出力为心,不可仅顾一己。”并对“民族主义”作出了解释:“怎么国家倒可容外族人来执掌主权呢? 即不幸为异族所占,虽千百年之久,也必要设法恢复转来,这就叫做民族主义。”^{[7]43} 不过,作者并未就“民族”及其“主义”给出更多的诠释。

蔡元培的《新年梦》于1904年发表于《俄事警闻》,时间介于上述两篇作品之间。日俄战争为其时知识精英最为关心的事件,国内报纸杂志纷纷辟专栏报道此事。一方面对清廷不得不保持中立的态度愤怒而无奈,另一方面在对待双方的态度上有着明显的“亲日反俄”倾向。有着强烈的无政府主义^①倾向的蔡元培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表了这篇小说。一方面是受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对西方帝国主义的反感,《新年梦》更倾向于世界主义的和平景象。此时蔡氏最高理想就是国民能由“家人”变为“国人”,进而成为“世界人”。

蔡元培国家思想的代言人“中国一民”,留学美法德,又游历英意俄瑞士等国,然后考察了中国。如此丰富的阅历使“中国一民”认识到人类之所以不能胜自然,“是因为地球上——一国一国的分了,各要贪自己国里的便宜。……一国之中,又是一家一家的分了,各要顾自己家里的便宜,把人的力量都靡费掉了”^{[9]231},这时的国人尚无国民意识,不知爱国。“爱家不爱国”的景象让“中国一民”十分失望。

在怅然若失的正月初一,“中国一民”的理想在梦中实现了;他来到了一个新世界,成了家乡公举的议员,议案讨论及实施由此成为小说主体。内政方面主要有:调查地理与人口,区划建筑,划分职业,规划民众一生的课程、每人一日的课程等五个主要方面以及各种子目;外交分三步走:恢复东三省,消灭各国势力范围,撤销租借。实现内政、外交等政治策略的要素,则是爱国心、技艺、枪炮弹药。“我们支那人并不穷,有许多人藏着钱,不肯拿出来归公中用,反要把公中的钱刮回家里去。”^{[9]237}“其实造个新中国也不难,只要各人都把靡费在家里面的力量充公就好了!”^{[9]231}

怎么办? 与“民权村”的“以点带面”树立样板进而泽被全国的路径设计相一致,“先造个模范村,先教上流最明白的人实行起来”,中流人通过读书、阅报、谈话,“下等社会,他因为有许多小说、唱本、演说坛、戏院”等潜移默化影响,“不到一年竟做到全国一心”^{[9]238}。东北三省顺利收回,但外交策略谋划的第二、三件事,除却极重民权的美国,其余列强并不答应。“他们平日看着支那这片大陆温和丰富,真同天国一般。住在上面,又是些劣等动物,好像犬马牛羊。”^{[9]239}好在此时国人国民意识高涨,同时各国海陆军被中国击败,列强势力范围遁迹,“租借”化为无形。但“我们虽然战胜,但并不借此占便宜,趁着各国军备零落的时候,就提出弭兵会的宗旨来。请设一万国公法裁判所,练世界军若干队”,“从此各国竟没有战事”,“文明的事业达到极顶”^{[9]241},以至于“到星球上去殖民,这才是地球上人类竞争心的归宿呢”^{[9]242}。民族认同的政治考量,让位于人类未来的奇思妙想。

蔡氏小说毋宁说是康有为政治遗嘱《大同书》的文学想象^[10]。由此可见“民族建国”不过是其时知识精英的应激反应,而“世界大同”才是他们最终可以认同的理想。

陆士谔的《新中国》(1910)将主要关注点放在了内政上。虚写了过程,实写的是结果,即立宪运动成功以后的“新中国”。

“宣统二年正月初一日”,叙事者梦游了40年以后的“新中国”。在大约5万字的篇幅内,就未来“新中国”的政治、军事、工商业、教育、交通、医药、文化、捕捞业等进行了全方位的想象,且均已超过欧美各邦;赌博、妓女、缠足、吸食鸦片都已禁绝。

^① 据蔡元培向黄世晖口述《传略》时说:“是时西洋社会主义家废财产、废婚姻之说,已流入中国,子民亦深信之,曾于《警钟》(实为《俄事警闻》)中揭《新年梦》小说以见意。”

这一切都是通过其友李友琴女士之口以及两人在“新上海”的游历展现出来的——“中国人勤俭耐劳、平和廉让，本非他邦人所及得上。智慧聪明，又远胜他国人。当时所以萎靡不振者，都缘政体不良之故。”^[1]

《新中国》中有关教育发达、皇帝开明、外国人学习汉语等情节，在医药、交通、军事等方面的想象，也可以在其他想象未来中国的小说中觅及。中华帝国已然“遍体鳞伤”，虽有“睡狮”的沮丧，但仍有“醒狮”的可能。种种道路选择的论争，在这类小说中均有表现，建立独立富强的民族国家是他们的共同理想。

由于作者政治理念的分型，在实现途径方面的差异是显然的。人们仍可从中辨析出其时知识精英对中国从“睡狮”到“醒狮”的共同信念：中国将在一个甲子轮回之后，成为世界强国，并且将是领导并维护世界和平的大国。

有理据相佐，本文选取的4篇小说形成互文关系：《新中国未来记》中黄、李二君在旅顺、上海所见乃现实中国的内忧外患。《狮子吼》的爱国志士通过“民权村”这样一个“模范村”的地方自治的训练，开始联合国内外的有生力量：秘密会党与留学生，由理念走向政治实践。《新中国》可以说是《新中国未来记》理念的实现，而《新年梦》可以说是《狮子吼》的远景目标。《新中国》与《新年梦》的共同愿望则是政治开明、经济发达、教育普及、世界和平，这正是各个政治团体建立民族国家的共同愿景。

晚清作家对中国未来复兴的浪漫想象、对现代民族国家的期望，除了西方国家这一现实参照系外，所凭藉的理论主要是赫胥黎的“进化论”与卢梭的民约论，前者使他们秉有了乐观主义-进步主义的信念，后者为他们提供了中国由传统国家转变为现代国家的依据——“国民总意”。

显然，清末文人政治话语，先天地存有缺陷：仅

仅停留于“民族国家”想象，尚未完成国家理论的建构。所以，辛亥革命后，一种深刻的挫折感氤氲而生，尤其是敏感的文人，失去想象的激情，而转向享乐的现实主义，有关“新中国”想象的小说也由此终结。政治激情已丧失了时代的动因，“官场”隐匿，“情场”成为文学的主题。

总之，上述分析的文学文本中的“新中国”，尽管对时政作出了相当敏锐的反映，但基本上是一厢情愿的书斋想象，亦即没有明确地把民族国家的建构作为政治思考的重心。这些对于政治的关注，无论是参与的热情，还是问题涉及的深度，都是值得尊敬的，但是，他们没有也不可能对传统中国政治的反现代性本质作出符合学理的清算与批判，普遍地昧于宪政-公民的合法性与正当性的论证。

参考文献：

- [1] 马睿. 近代文化变革与中国小说理论的兴起[J].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2(4): 126-131.
- [2] 杨联芬. 现代性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反思[J].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4(2): 152-155.
- [3] 耿传明. “开明的保守派”——“谴责小说”作家群的文化性格考察[J]. 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6): 55-61.
- [4] 梁启超. 新中国未来记[G]//中国近代小说大系(46). 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1996.
- [5] 梁启超. 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G]//陈平原, 夏晓虹. 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 第1卷(1897-1916).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59.
- [6] 梁启超. 新大陆游记[J]. 新民丛报临时增刊, 1903.
- [7] 陈天华. 狮子吼[G]//中国近代珍本小说(8).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1997.
- [8] 陈天华. 绝命书[J]. 民报, 1906(2).
- [9] 蔡元培. 新年梦[M]//蔡元培全集: 第1卷. 北京: 中华书局, 1984.
- [10] 郑丽丽, 郭继宁. 关于美好未来的政治遗嘱——《大同书》乌托邦方案探析[J]. 船山学刊, 2009(1): 87-90.
- [11] 陆士谔. 新中国[G]//中国近代小说大系(9).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1996: 488.

责任编辑 韩云波

The Imagination of “New China” from the New Novel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GUO Ji-ning, ZHENG Li-li

(Department of Chinese, Tangshan Teacher's College, Tangshan 063000, China)

Abstract: The imagination of “New China” from the new novel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have political purpose of the Enlightenment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purpose of National Salvation by “the Novel”. This paper selected a different political orientation of the four novels intertextually related. From this, we can see the shared vision from the Chinese intellectuals at that time that China will become a “Lion” from “sleeping lion”. The new Novel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merely to “nation-state” imagin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ountry theory has not yet been completed.

Key words: the new novel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New China”; imagination